

南斯拉夫的內部困難

尹慶耀

當中共從事內部大整肅時，南共(共產主義者聯盟)也有類似的行動。前此被認為毛澤東之繼承人的劉少奇遭受打擊，而狄托(Josip Broz Tito)也把他的繼承人亞·蘭柯維奇(Aleksander Ranković)加以整肅。不過，二者整肅的規模不同。從共黨的立場看來，可以說中共是走向極左，而南斯拉夫則在走向極右。

狄托手下原有三傑，就是亞·蘭柯維奇、愛·卡德爾(Edvard Kardelj)和米·吉拉斯(Milovan Djilas)。蘭柯維奇被稱為保守派，卡德爾被稱為自由派，而吉拉斯現今被稱為超自由派。他們雖從第二次大戰的游擊時代起，就都是狄托的左右手，戰後又都會是狄托的副總統，但現今却有了不同的下場。

吉拉斯早年就是學生領袖，鼓動學潮、參加罷工，是一個左傾份子，且曾被捕入獄。大戰期間參加游擊活動，一九五三年當選國民議會議長，被認為有希望繼承狄托。但一九五四年一月即因「染受西方影響，乖離黨的路線」，被剝奪一切黨政職務。翌年曾被判刑十八個月，緩刑三年。一九五六年因在美國「新領袖」週刊評論匈牙利革命，於十一月十九日被捕，十二月十二日判刑三年。他在獄中寫成了聞名世界的「新階級」一書，被判九年徒刑，服刑四年又兩個月後假釋出獄，却又因「會見史達林記」一書，再被判刑四年，迄今仍繫獄中。

蘭柯維奇生於一九〇一年。一九二九年會因反政府活動被捕入獄。一九四五年任南國內長，一九四八年兼副總理。當國際共黨情報局公開排斥南共

後，他負責鎮壓國內的反狄托派。一九五三年以來，一手掌握祕密警察權力，在黨內形成蘭派，不時對政府及議會施加壓力。被整肅之前，他是南共中委書記和副總統，也是大家公認的狄托繼承人。而祕密警察是由他的心腹南共中委、聯邦執行委員會(內閣)內務委員會主席斯·斯特法諾維奇(Svetislav Stefanović)負責。

卡德爾生於一九一〇年，曾參加非法共黨及勞工運動，一九三〇年入獄，一九三二年獲釋，一九三四年逃亡海外。戰後於一九四五年任副總理，一九四八年兼任外長，同年以首席代表出席聯大。一九五三年任聯邦執行會議副主席(副總統)，一九六三年六月出任聯邦國民議會議長。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國通過新憲法，狄托成為終身總統，而副總統只有一人，由蘭柯維奇充任，南共理論家的卡德爾出任議會議長，一般人認為在權力鬥爭中，自由派似已居下風。但事實上鬥爭仍在進行，於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間達於頂點。五月間，自由派的議會副議長米·托多羅維奇(Miljko Todirović)擬訂了一份自由化計劃，無異是向保守派進行攻擊，當然也會遭遇到強烈的反擊。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南共在亞得里亞海北部伯里奧尼島召開四中全會，狄托在演說中公開發責蘭柯維奇和斯特法諾維奇的嚴重錯誤和爭權奪利。他說，有一批特工人員陰謀奪取政權，把勢力伸入全國每一個部門，全國都被他們滲透進去，并使用高壓手段，採用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作風，妨礙南國真正進行的經濟改革。

在狄托演說中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所謂「陰謀奪取政權」，西方報導更稱蘭柯維奇對狄托有陰謀企圖。中共「新華社」七月十六日的電訊說，據

南國報刊公佈的資料，蘭柯維奇等培植親信，私組「宗派集團」，另立「政治綱領」，「反對南共聯盟的路線」，進行「爭奪權利的鬥爭」，把他所領導的內務和保安等警察和特務組織「置於南共聯盟和社會之上」，並且「濫用職權」，安裝竊聽器，竊聽狄托等人的講話。電訊又說，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內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鬥爭由來已久。狄托在四中全會上說，這一鬥爭不是「最新的事情」，而是在十年前就已開始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南共聯盟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會經討論過「領導人的關係」問題。現在這種爭奪權利的鬥爭「又重新以更激烈更嚴重的形式出現了」。

其他方面資料報導，狄托會自承他老早就想排除蘭柯維奇，但因不能確知國內情勢將有如何的反應與發展而一再躊躇。由這些話裏，我們可以察知蘭柯維奇勢力的強大，直到目前的最嚴重關頭，狄托才下決心加以整肅，但蘭的勢力是否就此完全崩潰，恐仍屬疑問。

狄托演說後，蘭柯維奇立即請辭南共書記及副總統職務，全會特別調查委員會建議准其辭職，認為他應對與黨的活動不相容的政策負責。并建議將斯特法諾維奇開除黨籍。七月六日和十四日，國民議會先後解除了斯特法諾維奇和蘭柯維奇的行政職務。

蘭柯維奇的中委書記職務，由托多羅維奇繼任；副總統職務則由一九五四至六五年四月曾任外長的科·波波維奇（Koda Popovic）接替。前引「新華社」電訊說，狄托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的鬥爭，沒有、也不可能由蘭柯維奇的下台而告終。狄托在全會講話中宣稱，要對南共聯盟和國家保安部門進行「改組和清洗」。他說，不僅要「改組」南共聯盟中央的「領導」，還要「改組」聯邦各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和「審查幹部」。全會還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研究召開南共聯盟「非常代表大會」的問題。另據西方報導，七月初以降，南國中央及地方治安部門大事整肅，包括同月二十七日整肅其內次在內。

狄托演說中另一可注意之點，即所謂「妨礙南國現正進行的經濟改革」。這是保守、自由兩派最近鬥爭的焦點，狄托本人是站在自由派方面的。「新華社」電訊說，南共聯盟四中全會上所暴露出來的統治集團的內訌表明：南斯拉夫由於資本主義復辟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出現的嚴重困難和危機，引起了南斯拉夫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促使了南斯拉夫新興資產階級特權

階層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同時，同這些集團的利害衝突交織在一起的，是國內民族矛盾的進一步惡化（註一）。電訊的詞句帶有不少諷諷意味，但當前南國政潮中，是在經濟問題上採雜着民族矛盾成分，却是事實。

二

狄托是一個十足的共產主義者，在初期甚至是史達林崇拜者。南國赤化後，他於一九四六年初，就制定了蘇俄式的人民共和國憲法，跟着實行產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一九四七年就開始五年計劃，那種性急的模倣，甚至使得蘇俄也要忠告他「不可過火」。當時南國的國民經濟，幾乎百分之百依存於蘇俄與東歐。可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國際共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它在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共產集團的關係，幾乎完全被切斷。狄托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只有掙扎着自己站起來。在經濟方面，對外須爭取援助，對內則緩和社會化，以免其全面崩潰。

在國內，南共首先確定的原則，是減少中央集權，而加強地方分權。本此構想，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制定法律，由籌措資金到分配利潤，都交由企業自主，同時各企業成立勞動者評議會，由工人參加經營工廠。現今，南國企業，係以評議會為中心，在經營上採獨立核算制，企業負責人也可由評議會公開徵募有能者充任。

中共資料中說：南斯拉夫工業企業實行所謂「企業自治」，在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各企業由少數領導人操縱經營管理的大權，可以根據市場情況自己確定產品的產量、品種和價格，自己採購原料和在國內外市場推銷產品，自己決定利潤和工資的分配辦法，自負盈虧（註二）。中共又列舉左述事實，加以抨擊：

一九五三年，狄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伙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用勞動力」。同年又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一九五六年從稅收政策等方面，鼓勵地方政權扶植私人資本。一九六一年規定，私人有購買外匯的權利。一九六三年憲法規定，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可以雇用勞動力（按係以五人為限）。農業方面，從一九五一年起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惡毒地咒罵「集

體化和剝奪是一回事」①，是一條「最長久地保持農奴制和農民的貧困」的道路②。荒謬地主張把農業的發展「建立在各種經濟力量自由競賽的基礎上」③。一九五三年開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雇工，並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鼓勵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註三）。

根據右述事實，中共就斷言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蘇俄是承認南斯拉夫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而西歐專家大多數的意見，也只稱南國經濟上的若干作法為「自由化」。我們在此只願指出，南國經濟的「自由化」，是在與蘇俄分手後，隨著情勢的發展不得不爾，而不是從赤化時期一開始就有的預定計劃。

三

南斯拉夫的內部情形是相當複雜的。它有一個黨、兩種文字、三種語言、四種宗教、五種民族和六個共和國（註四）。但當狄托挺身抵抗大國蘇聯和世界共黨首領史達林時，他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除極少數親俄份子外，全國上下都表現了空前的團結。狄托甚至贏得他的敵人的稱讚。

當時南斯拉夫與西方關係不佳，與美國之間有的港問題，與希臘之間有希共問題，與美國關係也很僵，美國正要凍結南在美所存黃金。而蘇俄則率東歐附庸，對南實施經濟封鎖，且調動附庸軍隊，製造邊境糾紛。於是南斯拉夫不得不轉向西方搭線。它首先停止對希共的支援。一九四九年西德成立，南第一個與之建交（嗣因承認東德而又絕交）。在韓戰期間曾投票贊成聯合國派兵。一九五四年與希臘、土耳其締結巴爾幹聯盟。

在與西方改善關係的同時，南國也獲得軍經援助。截至一九六一年，來自美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已達三〇餘億美元。而同年度英、法、西德等三國總計，給予南貸款四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其他如奧、荷、瑞士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均會給予貸款。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東、亞、非地區二十五個不結盟國家在貝爾格萊德舉行會議，是狄托外交成就的最高峯。他似乎已成為「第三勢力」中的顯要人物。同時，南國與共產集團的關係除共匪外，亦在改善中。本來，史達林死後，黑魯曉夫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訪南，雙方關係一度好轉，嗣因匈牙利改革

命事件又趨冷淡。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後，蘇俄與共匪及阿爾巴尼亞關係惡化，俄南關係則漸趨好轉。一九六二年九月布里茲涅夫（時為最高蘇維埃主席）訪南，一九六三年九月黑魯曉夫訪問狄托。狄托亦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度訪問蘇俄，一九六六年九月布里茲涅夫再訪貝爾格萊德。隨着俄南關係的改善，南國與東歐的關係也日趨密切。

狄托從德軍佔領下解放了南斯拉夫，從經濟困難和外交孤立中挽救了南斯拉夫，然而此後的事態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萬事如意。

四

一九四八年以後，狄托從西方接受了大量經援，解救了一時的危困。然而那些貸款需要償本付息，現在變成了南國人民的沉重負擔。同樣，當狄托與東方集團關係惡化時，不得不轉與西方增進貿易。可是工業落後的南國，輸出者少而輸入者多，貿易赤字無法消除。南國貨幣幣納爾（註五），從一九六〇至六四年下跌了四分之一，而國內物價則上漲了三倍。生活困難影響到國民心理，他們對於共產主義漸漸懷疑。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南共第八次大會時，蘭柯維奇就報告說，過去八年，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的黨員，其百分比已自二三·六%降為一三·六%。又說，南斯拉夫農民佔全國人口之半，而農民黨員僅佔黨員總數八%。上述狄托在四中全會演說，直言南共已失去對人民的影響力，必須改組。

為了應付內部複雜的民族與地域問題，狄托也把大幅權力移讓給各共和國，實行了地方自治。雖有人稱狄托為南國團結的象徵，但事實上地方歧見并未消除。本來，南斯拉夫內部也有「南北問題」存在。北部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生活水準較高，南部的塞爾維亞、馬其頓等比較貧困。蘭柯維奇和斯特法諾維奇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們掌握了秘密警察而又主張中央集權，很明顯地他們是想恢復第一次大戰後南斯拉夫王國中，塞爾維亞對其他各族的支配地位。卡德爾是斯洛文尼亞人，他主張地方分權和經濟自由化，但蘭柯維奇認為經濟自由化是犧牲南部，而使北部獲利，因而加以反對。

經濟利害與民族歧見之外，還存在着思想上的差異，使情形愈加複雜。在思想上，蘭柯維奇是保守份子，但他也是實權人物，早在一九六四年南共

八次大會之前，國內即盛傳當時七十二歲的狄托將辭去總統職務，這消息使狄托本人非常震怒，親自對記者宣稱：「誰都不會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引退。我還能不能執行自己的職務，只有大會可以決定」。近年來爲了重建不結盟路線，狄托時或奔走國外，蘭柯維奇却在國內建立了高過狄托的實力，如果他對自由化措施的不滿繼續發展，很可能威脅到狄托的地位。這或者是狄托決心去掉蘭柯維奇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就共產集團言，雖然南斯拉夫已比較自由化，但人民的自由願望尤強於物質欲望，一經嘗試就不易遏止。一九六五年起至一九六六年初，各地已有反狄托運動出現。一九六五年四月克羅地亞共和國有約四〇名大學生，向中央政府要求「自由」。五月間若干大學生因示威被捕入獄。斯洛文尼亞共和國迄今時有以大學生爲中心的「反共產主義」運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南國逮捕了青年作家米哈伊洛·米哈伊洛夫（Mihajlo Mihajlov），他年僅三十一歲，本爲大學講師。一九六五年時，他在南國文學雜誌「Delo」一、二月號上，發表了「一九六四年莫斯科之夏」等報道文學，指出集體屠殺及集中營的創始者，不是納粹德國而是共產主義的蘇俄，而且是在列寧在世的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二年時，即已存在的。米哈伊洛夫是吉拉斯崇拜者，常常說：「我的立場，和以自由的精神追求自由的社會之吉拉斯相同」。早在國際情報局公開排斥南共之前，吉拉斯就在報上爲文攻擊史達林，那時是被允許的，但當他發表「會見史達林記」時，俄南關係業經改善。同樣，米哈伊洛夫發表「莫斯科之夏」時，正值蘇俄大肆抨擊納粹陰影仍然籠罩西德之際，於是他也被判刑九月（七週後出獄）。這顯然與開罪友邦蘇俄有關。不過，「超自由派」的矛頭，并不僅僅指向莫斯科。所謂「超自由派」，並沒有有形的組織和具體的反共行動，但他們那種自由精神滲透到知識階層，却頗使得南共頭痛。米哈伊洛夫第二次被捕，正當他領導的青年們籌備出版新雜誌「自由之聲」發刊之前，他這次被判刑一年。當他被捕後，他的同志們聲言，雜誌仍將出版。又被捕前兩天，他曾在維也納一份文化雜誌上發表文章，題爲「信仰吉拉斯」，文中指責「一黨獨裁是不自然而無視憲法，我們對只有抱共產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從事政治活動的社會，已經感到厭倦，現今是清算共黨一黨獨裁，創立自由民主的多黨政治的時候了」。同時他在西德一份週刊上刊載了一篇問答。內有：

問：狄托的繼成人爲誰？

答：當然是吉拉斯。

問：你是說吉拉斯的思想嗎？

答：不，我是說現在獄中的吉拉斯這個人。

問：你相信南斯拉夫會成爲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答：假如我的雜誌出版，大家都會憧憬多黨制度，且可奠立其基礎，我會抱着信心幹下去。

如前所述，狄托現今受着來自右方的「保守派」的攻擊，和來自左方的「超自由派」的攻擊，這就象徵着狄托以及南斯拉夫型共產主義的苦惱。

五

南共內部最近的鬥爭，起因於經濟自由化。如前所述，最初由中央集權化而地方分權化，提高企業的自主性，顯然是因爲蘇俄封鎖，經濟困窘，政府不得不盡量減輕本身的經濟負擔與責任，一方面也爲了更便於向西方求援而表演一下自由化的姿態，那並非出於既定的步調和嚴整的計劃。

大致說來，各共和國自治、勞動評議會自主、各企業採獨立核算制，是南斯拉夫經濟的特徵。然而基本上各企業仍爲公有營，中央并未放棄其全國性的計劃。并且，一則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再則享有自治權的各共和國都有本位主義，於是常以大量資金在距離原料產地遙遠、缺乏運輸設備的地區，創設一些「政治工廠」（即以政治理由設置的工廠）。而分權制度的銀行，也常以資金投入「政治工廠」，津貼不能夠盈利但爲其所支持的企業。東部、南部經濟落後地區的「政治工廠」約佔全部工廠的二五%，它們都依靠津貼來維持。北部的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比較發達，是南國的工業中心，那裏的企業是盈利的，但須付出極高的稅款，來津貼東、南部的「政治工廠」。這自然妨礙了全國性的工業發展，更會加深地方的歧見。斯洛文尼亞人口僅當全聯邦八、六%，但一九五八年就負擔聯邦預算三七·二%，那裏的人批評上述「政治工廠」的情形是：「失敗者賞，成功者罰」。卡德爾主張經濟更加自由化，則東南部的「政治工廠」，必然會在較多的自由競爭中落伍，因而蘭柯維奇等表示反對。

勞動者評議會制度也有其弊端，因爲工人注意的不是企業發展與擴大再

生產，而是個人工資的增加，於是企業利潤的一大部分不用於擴充設備，却被工人吃掉，因之，產品價格也須要跟著工資上漲。

南國政府不斷以財政支持其基本工業，又爲了增加出口，而容許有超計劃的進口。不過，輸入增加的壓力將使其不勝負荷。它授權外貿銀行爲企業提供外匯，以相應地提高輸出。一九六四年給予各企業的貸款增加四五%，但同年進口商品總額僅增二五%，其餘差額被勞動者評議會用以提高工資及紅利，致非農業人民實際收入增三〇%，使國內消費品供不應求，刺激了通貨膨脹。

南國雖已大量解散集體農場，但其農業投資集中於共營農業部門，增加其機器設備，提高其技術水準，希望以豐產、厚利的「優越性」，吸引農民復回到集體化道路，然而一九六三年底，南國最大的貝利Bele。國營農場宣布虧損二〇億第納爾，於是上述的希望也就落了空。目前，南國農業人口已降至總人口五〇%以下，農業以私營爲主，但每年仍須由國外輸入小麥，以補糧食之不足。

南斯拉夫是實行經濟自由化最早的共產國家，一般而言，在共產國家內它的經濟發展也比較迅速。從一九五五至六五年這十年之內，它的工業生產增加三五%，農業生產增加五五%，實際工資增加了二·二倍。然而這些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一波三折。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分權措施操之過急，工人管理工廠，依賴市場競爭，產生了副作用。一九五六年乃加強管制，停止工資的增長，經濟秩序雖得恢復，却引起一九五八年的工人罷工。於是，南共緩和了它的政策，生產隨之提高，又遇上兩年豐收，造成了一時的繁榮。一九六一年全部廢除工資限制，放寬對物價、生產與對外貿易的管制，并增加消費品的供應。結果是工資激增、物價飛漲，進口貨源源輸入，一九六四年的貿易赤字，高達一、三〇〇億第納爾。

南國一如其他共產國家，要維持高度投資率。一九六四年其主要產品方面的投資，突增五八%。它竭力建設工廠而不能及時投入生產。它要將個人收入提高四二%，且全力擴展房屋、電力、公路、鐵路等建設，結果是加深了通貨膨脹，使大部消費品價格接近了西歐水準，但工資却僅及西歐三分之一。同年九月，南政府決針對通貨膨脹採取行動。十月間宣布不再批准政府機構新建辦公室，在建築中的除已支付建築費用二五%者，均須停工。一

九六五年初，命令銀行設法增加儲蓄、限制貸款。三月間開始緊縮頭寸、凍結物價，削減政府預算五%，并將主要產品產量較上年度壓低三%……

爲了擴展對外貿易，它於一九六二年就成爲「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準會員國，一九六五年一月又申請正式加盟。它與「歐洲共同市場」本有聯繫；又向「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圖謀接近；而一九六三年九月，它也部分的加入了蘇俄東歐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在外交上，它與西方保持接觸，與「東方」改善關係，在「第三世界」搞不結盟運動，一九六六年六月又與梵蒂岡正式復交。其動機包括政治、經濟兩面，總的目標是唯利是圖。

六

南斯拉夫的整個政策，顯得反覆而又矛盾，這是由於它：（一）要在共黨獨裁的政體下，對地方及人民放寬一些政治自由。（二）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吸取一些分權的市場經濟的利益。（三）身爲共產國家，但要在共產陣容內保持民族獨立；在思想上與資本主義爲敵，在外交上與西方積極共存；在「第三世界」爭取領導地位。

這樣矛盾的立場，使它對內經濟遭遇困難，共黨聲威低落；對外地位下降，外援也遭遇停止的威脅。在此關頭，南共的政策究應後退或繼續前進呢？這恐怕是「保守」與「自由」之爭的焦點之一。

就目前政策而言，南共要繼續向自由化前進。一九六四年七月，正是南國通貨膨脹聲中，它採取了兩項措施：（一）經濟計劃以農業爲優先。過去只有與共營農業有聯帶關係的自耕農，才能接受資助，現在則對之加重保護。又農產品價格不由政府管制，准依生產成本等經濟因素決定。（二）在觀光業及飲食業領域內，部分恢復私營。過去私營的小企業雖可存在，但以建築業、承包業爲主，而觀光及飲食業准許私營之例極少。這些都是挽救當前經濟困難的應急措施。因爲南國工業製品僅靠輸出，則銷路有限，不能充分發揮其生產設備的能力，設能活潑農業經濟，提高農村生活水準，則可擴展內銷市場，解救工業危機。而發展觀光事業，增加外幣收入，可改善國際收支。其鄰邦希臘，觀光客較少而收入則較南爲多，原因在南國國營旅行社服務態度及工作效率欠佳，放寬私營，估計其觀光收入可由每年一億美元，一

躍而增至五億美元。然而上述措施，却都意味著擴大私營企業的范围。

一九六六年三月，因保守派對自由派的經濟改革，處處掣肘，使狄托頗為震怒，此後自由派逐漸得勢，報章上屢有限制黨的權力之論調出現。五月間自由派的國民議會副議長托多羅維奇擬定自由化計劃，其要點為：(一)黨的各委員會不介入獨立機關及其他行政機關。(二)議會應從黨的壓力下解放，發揮其獨自的機能。(三)黨不能使用民兵介入工廠經營。(四)黨應專心致志於思想意識方面的工作。這是以黨為中心來打擊保守派，也可反映蘭柯維奇等的勢力，是如何廣泛地滲透了黨、政、經濟機構。

七月一日狄托在四中全會演說的要點，可歸納為：(一)南共要由聯邦至各共和國，由幹部至黨員，加以改組與審查。(二)三年前黨所發表的經濟改革案并未執行，使黨失去了民衆的信仰。今後要清除只爲自己本身前途而入黨的非共產主義份子，保證黨的決策之執行。(三)要清除黨內的民族主義偏向，塞爾維亞共產黨人在這方面應扮演重要角色。(四)目前共產黨員不論教育程度如何，都担任重要工作，這是不對的。黨員的責任不是發號施令，而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指導人民。(五)黨最高機構執行委員會，應專心從事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領導。現今執委會成員兼任政府及議會要職而忽忽黨務。今後要專心執行黨的任務。

爲了研究黨的改組，南共任命了一個委員會，由卡德爾等負責。改組方案經十月四日中央全會通過，於中央委員會內設主席團及執行委員會。兩機構完全分離，其成員不得互兼職務。同時黨與國家的職權也完全分開，且實行黨內民主。中央委員會設書記處，并得成立一些特別委員會來處理一些必要問題。此外南共設一主席職位，由狄托充任。

很顯然，狄托目前是支持自由派的立場，但保守派的勢力依然存在。狄托演說中也提到說：爲了打倒任何對於黨與政府的陰謀，今後仍將求助於蘭柯維奇，只要他認爲必要，隨時可以陳述他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爲吉拉斯自由思想所滲透的「超自由派」，對於目前的自由化計劃，也不會感到滿意。換言之，左右雙方的反對力量依然強大。

經濟困難也不是自由化計劃所可輕易解決的。儘管南國早已實行分權，但它并未準備放棄計劃經濟制度；私營企業雖准許存在，但其規模與經營範圍均有限度，政府對之嚴格管制，隨時課以重稅或處以罰鍰，那決不是一般

的自由企業，而況經濟落後的先天條件，并非短期可以克服。

總之，在獨裁的共黨和計劃管制的經濟制度下，有程度放寬一些自由，或可收得些微效果，但不能澈底解決問題。政治上亦復如是，蘭柯維奇的整肅，「超自由派」的逮捕，并不能保證今後不會有同樣或更嚴重的問題發生。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晚，狄托在一五五人參加的南共中委會上明白宣稱：「我們與西方促進經濟合作與貿易，但我們在主義上不與西方接近」。南共實行的仍是共產主義，它不會依照部分西方人士的願望，走向資本主義。

註一：本節文內所引「新華社」電訊，俱見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註二：見中共一九六一年版「世界知識年鑑」。

註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本段中①原註卡德爾：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四屆九中全會上的開幕詞。②巴卡里奇(Vladimir Bakarić)：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③卡德爾：「關於我們農村政策的若干問題」。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雜誌，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註四：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黑山(門的內哥羅)、馬其頓等人民共和國；五種民族：塞爾維亞(四一%)、克羅地亞(二三·四%)、斯洛文尼亞(八·八%)、馬其頓(五·三%)、門的內哥羅(二·八%)；四種宗教：塞爾維亞正教(四八%)、天主教(三六%)、回教(一四%)、猶太教；三種語言：塞、克、波三國人爲塞爾伯(Serbo-Croatian)語，斯洛文尼亞人用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人用馬其頓語，均爲南斯拉夫公用語，實際亦僅係方言之差；兩種文字：塞爾伯(Serbo-Croatian)語用羅馬字及 Cyrillic 文(俄文字母)兩種。其中塞、波、門三國兩種文字併用，克羅地亞及斯洛文尼亞使用羅馬字，馬其頓使用俄文字母。一個黨：即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註五：第納爾(Dinar)爲南斯拉夫貨幣單位。原定匯率七五〇第納爾=一美元，現一、二五〇第納爾=一美元。